

# 部分图书馆学情报学译作中的瑕疵

□胡立耘

**摘要** 在某些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译作中,存在沿用原著错误、语义模糊、术语歧义等瑕疵,可细读原著加以纠正。对读译作与原著,有益于充分理解原著的内涵,并更好地体会译者的匠心。

**关键词** 翻译 原著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译作与原著可以说是互为镜子。译作是在忠实反映原作的前提下,呈现译者个人知性、才情和见地的舞台,以原著为镜子,可照出译著的特点。尤其是当有两个以上的译本时,更可在译本中寻觅译者的个人特色。如梁实秋版与朱生豪版的《莎士比亚全集》,金隄版与萧乾、文洁若版的《尤利西斯》。反过来,以译作为镜子,可指引读者把握原著的精妙意味或细微内容。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言,“翻译是诗的技巧能够被肯定的最纯粹的程序”,翻译也是理解原文精髓的一条捷径。

当然,除了校译者和外语翻译的学习者,也许很少有读者将译作与原著一一对读,但是,当在阅读译作时,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句段,对照原文应该是最先考虑的途径。近年来,Google books 及图书馆便捷的文献传递服务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可获取性,因而这种对读也变得相对容易实现。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专业文献翻译,尽管不同于文学翻译那么强调遣词造句及个人风格,但是,术语的运用、细节的考证同样也是费人思量的。以下是我在阅读几本图书馆学情报学译作时的体会。

## 1 一个公式引发的求证

在拜读《现代信息检索》时,第93页的公式(5-11)<sup>[1]</sup>让我感到十分迷惑:

$$\omega_{i,j} = \frac{\left[0.5 + 0.5 \frac{f_{i,j}}{\max_j(f_{i,j})}\right] it f_j}{\sqrt{\sum_{i=1}^N \left[0.5 + 0.5 \frac{f_{i,t}}{\max_t(f_{i,t})}\right]^2 it f_j^2}}$$

图1 《现代信息检索》第93页的公式(5-11)

这是基于相似性叙词表的查询扩展中,计算“索引—文献”二元组的 $[k_i, d_j]$ 对应的权值的公式,但显然, $it f_j$ 在上式中可约去。查对原版中对应的公式(5.11)<sup>[2]</sup>,仍是如此。查检《信息组织与检索》中的公式(6.24)<sup>[3]</sup>、《信息检索技术》中的(9-31)<sup>[4]</sup>,也有相同或类似的错误。事实上,正确的公式应该是将分母的 $it f_j^2$ 改为 $it f_i^2$ <sup>[5]</sup>。

在原著中产生的错误被沿用到译作中的另一个例子来自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该译作中的一句:“中世纪第一个著名的宫廷藏书家、查理曼大帝的孙子秃顶查理,召邓斯·司各脱到他的皇宫学院监督检查学术工作。”<sup>[6]</sup>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信息,因为秃头查理的卒年是公元823—877年,而邓斯·司各脱的生卒年是约公元1265—1308年。查看原著,原著上亦为:Charlemagne's grandson, Charles the Bald, known as the first princely bibliophile of the Middle Ages, brought Duns Scotus to his palace school to supervise the scholarly work being done there<sup>[7]</sup>。经考证,是谢拉误将约翰·司各脱·厄里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810—约877)当作了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尽管两人都是哲学家,但是被张冠李戴了。约翰·司各脱应秃头查理的邀请担任宫廷学校的校长的事实可参看梯利或罗素的《西方哲学史》<sup>[8]</sup>。

在翻译中,除了保证信、达、雅,尊重知识本身的真实性也是重要的。若用注释加以纠正其错误,可避免以讹传讹。

## 2 为卡内基伸冤

原谅我采用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标题。不过,如果您仔细看了下面两句话,就会觉得卡内基可真是冤枉。

在《图书馆学引论》第一章,有这样一句:“如同美国一样,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安德鲁·卡内基的捐款。……很明显,安德鲁·卡内基这个英格兰人并不象约翰博士同情苏格兰人那样同情英国。<sup>[9]</sup>”这句话前后显然矛盾,查看原文,后半句是:“Quite obviously Andrew Carnegie, the Scot, did not feel about England as Dr. Johnson did about the Scots.<sup>[10]</sup>” Dr. Johnson 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他于1755年出版了著名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而在词典中,“Scots”有一个含义是小气的、节俭的。这就可以理解,后半句话是一句十分风趣的俏皮话,即:“安德鲁·卡内基这个苏格兰人对待英国可并不像约翰逊博士对苏格兰人的看法。”

该书同一章中,还有一段话:“尽管有了卡内基财产的资助,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似乎在蒸蒸日上,但人们不禁想到,如果这位善良的苏格兰人不投资数百万于钢铁工业,而记得他年轻时在苏格兰高地对书籍如饥似渴的情况的话,那么公共图书馆将发展到什么程度<sup>[11]</sup>! 查看原文为:Though public libraries seemed to be well in the ascendant when Carnegie made his fortune available, one cannot but wonder how rapidly the movement would have developed had this benevolent Scotsman not made millions in the steel industry and remembered the book starvation of his youth in the highlands of his native country<sup>[12]</sup>. 看来,原文的意思是:“尽管在卡内基开始资助图书馆之时,公共图书馆似已步入上升期,但是,如果这位慈善的苏格兰人没有在钢铁领域获得巨额财富并且仍然记得他年轻时在苏格兰高地对书籍如饥似渴的情形的话,人们仅仅只能设想公共图书馆应该如何迅猛发展。”

在该章中,还有一句译文值得质疑。即:“据说克利奥佩脱拉为了取悦于奥古斯都·凯撒,曾以亚历山大的藏书为代价以换取波尔加马的图书馆。”<sup>[13]</sup>原文为:Cleopatra, in an effort to curry fa-

vor with Augustus Caesar, is supposed to have given books from the Alexandria for the library at Pergamum<sup>[14]</sup>. 此处的意思应该是:“据说克娄巴特拉为了取悦奥古斯都·凯撒,曾把亚历山大的部分藏书给予波尔加马的图书馆。”这一点可参考哈里斯的《西方图书馆史》,书中指出:“公元前133年,帕加马落入罗马人手中。”据说安东尼在“公元前43年把帕加马图书馆20万卷图书送给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后来奥古斯都大帝又把这批图书部分或全部运回了帕加马”<sup>[15]</sup>。

此外,在《现代信息检索》第五章中写道:“参数MIDF定义了逆文献频率的最大值……<sup>[16]</sup>”查对原文:“The parameter MIDF defines the minimum value of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for any term……”<sup>[17]</sup>,故文中的最大值应为最小值。应是笔误,但若不核对原文,令人颇感困惑。

这种原文与译作的对照有时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本与原文对照的时候。例如,大主教伊萨多(Isadore)对塞维利亚(Seville)图书馆的馆藏赋诗一首,其中一个片段,在哈里斯译本中被译成自由诗体,而在谢拉译本中被译成押韵诗,两相对照,令人莞尔<sup>[18]</sup>。

## 3 术语翻译的笔墨官司

不同文化背景和使用情境使得术语翻译很难一致,强加对应的术语难免隔靴搔痒,乃至无法传达原文的真实意义。如在《21世纪美国大学图书馆运用的理论与实践》第十四章中,对“Community outreach”一词,作者老实地承认在汉语中难以找到相应译义的词语,分别将两个单词加以辨析,并姑且用“社会服务”代之<sup>[19]</sup>。因采用不同术语翻译一个外文词汇,可能导致有趣的笔墨官司。如皮高品曾就Bibliography的译法与毕吕贵论战,皮先生在文中指出翻译若“名不正,则言不顺”<sup>[20]</sup>。在有些情况下,术语翻译不仅可正名,有时甚至关系到内涵的确立,进而作为基本观念的阐发与论证的逻辑起点。所以才会有学界对“图书馆权利”的术语分歧<sup>[21]</sup>、对“治理”与“管理”的辨析<sup>[22]</sup>。

蒋永福在《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中强调该书中使用“Institution”时去掉了其中的“组织机构”的含义<sup>[23]</sup>,并引证说明在巴特勒、马丁、刘国钧的研

究中,早已明确提出图书馆是一种制度。在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中,也是把制度与机构分别看待的,并指出图书馆是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机构。如果不在翻译中辨析 Institution 的词义,就不能反映出谢拉关于社会制度与图书馆之关系的观点。在《图书馆学引论》第二章,谢拉阐述了其文化三角中的底边——社会组织包括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等,尤其指出了图书馆是教育制度下的特定机构。而在《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中,将“*Institution*”翻译为“公共机构”,削弱了原文所具有的从制度的视角理解图书馆的含义<sup>[24]</sup>。原文对制度的解释是: These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a cluster of social phenomena, conventions, or formalized structures whereby a society fixes the limits of, exercises control over, and imposes form up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sup>[25]</sup>。《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中的翻译是:“社会公共机构是社会现象、风俗或形式化的架构,社会在其中限制和控制其成员的活动。”《图书馆学引论》中的翻译则为“社会体制是一组社会现象、惯例或具有一定形式的结构。通过这种结构社会对其成员的各种活动进行控制,限制活动范围,规定活动形式。”<sup>[26]</sup>显然后者相对要妥当些。

术语的翻译不仅应考虑词源、文化背景、语境等各方面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应考虑与实际使用的通行术语的对应关系。如果在现实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了通行术语,则尽量用此术语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可利用一些权威的专业工具书,如百科全书、专业词典、双语或多语专业词典,作为翻译术语选择的基本依据。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sup>[27]</sup>及1999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sup>[28]</sup>、《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词典》<sup>[29]</sup>、《英汉图书馆学词典》<sup>[30]</sup>、《英汉图书馆情报学词汇》<sup>[31]</sup>、《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sup>[32]</sup>等。此外,还应参考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方面的权威译本。例如,有关信息组织方面的术语翻译应参照 ISBD、AACR2r 已有的翻译文本及国内通行的术语表达。《信息组织》在翻译过程中,有些术语的翻译具有随意性,因而使读者较难理解。例如,在该书中,术语“超文本标志语言”与“超文本标记语言”交替使用;把“MARC commu-

nication format”翻译为“MARC 交流格式”,而不用“机读目录通讯格式”;把 MARC21 格式中的五种格式之一“Community information format”翻译成“区域共同信息格式”,而不用国内通用的译法“团体信息格式”<sup>[33]</sup>。再看以下两段话:

第一段:“利用 ISBD 制作替代记录有两件事情需要牢牢记住。第一,ISBD 符号是预先设定好的,它规定并预示着紧跟其后的数据要素。比如,项目 1 的‘/’说明下面是责任说明。第二,数据的顺序也事先规定好的。比如,项目 1 中,内容和符号是这样预置的:题名[GMD]:副题名/第一责任者说明;第二责任者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标点符号的预置是通过前后的空格协助完成的。”<sup>[34]</sup>此段原文为:“There are two things to remember about ISBD. First, ISBD punctuation is prescribed, and it precedes and predicts the data element that comes next. For example a space-slash-space in Area 1 says that the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is coming next. Second, the order of data is prescribed. For example, In Area 1 prescribed content and punctuation is: title [GMD] subtitle / 1st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 2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escribed punctuation is both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a space.”<sup>[35]</sup>参看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0.2 定义中对相关术语的翻译及定义,“element”翻译为“单元”,“Prescribed punctuation”翻译为“规定的标识符号”<sup>[36]</sup>,此段或可翻译为:“关于 ISBD,有两件事需特别指出:其一,ISBD 的标识符号是被预先规定好的,置于数据单元之前,用来表示其后相应的数据单元。例如,在第一大项中,‘/’表明跟随其后的是责任说明;其二,数据的顺序也是被预先规定好的。例如,在第一大项所规定的内容和标识符号依次为:题名[GMD]:副题名/第一责任者说明;第二责任者说明。从此例看出,规定的标识符号前后各有一空格。”

第二段:“在 AACR2R 中,项目 3[材料(出版类型)细节]只被用于地图、印刷乐谱、计算机文档和连续出版物,下面举的一些例子就是在项目 3 的四种信息载体类型中使用的词:

- 地图:比例尺 1:24 000 ;多圆锥投影图
- 印刷型乐谱:核心和部分集

- 电子资源:电子程序
- 期刊: Vol.1, no. 1 (1997年1月) — ”<sup>[37]</sup>

此段原文为:“In AACR2r Area 3[material (or type of publication) specific details] is used only for maps, Printed music, computer files, and serials. Some examples of the wording that may be used in Area 3 for each of the four types of information packages are:

- Map: Scale 1:24,000; Polyconic proj.
- Printed music: Score and parts
- Electronic resource: Computer program
- Serial: Vol. 1, no. 1(Jan1997) — ”<sup>[38]</sup>

参看 ISBD, “material (or type of publication) specific details”译为“资料(或出版物类型)特殊细节项”,参看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乐谱)中的 3.1 印刷乐谱特定说明,其中“Score and set of parts”译为“总谱和分谱集”<sup>[39]</sup>。因此,此段或可翻译为:

“AACR2r 的第三大项[资料(或出版物类型)特殊细节项],只适用于地图、印刷乐谱、计算机文档和连续出版物。以下几例即为在该项中描述四种类型的信息资源所用的常用词。

- 地图: Scale(比例尺) 1 : 24 000 ; Polyconic proj. (多圆锥投影)
- 印刷乐谱: Score and parts (总谱和分谱)
- 电子资源: Computer program (计算机程序)
- 期刊: Vol. 1, no. 1(Jan. 1997) — ”

《信息组织》在其出版目的中指明可用作双语教材,但在其翻译过程中术语翻译若不准确,会导致学生在理解时的偏差。

#### 4 进入后翻译时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

系统地梳理、统计、研究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译著、译文乃至外文文献引用情况,是研究学术生态的一个好选题,可为学科史研究、中外学术交流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目前,除了景海燕的数篇论文,尚未见其他相关研究,尤其是以油印本形式出版的译著,港台版的译著、译文,以及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译著,如读书类、管理类的相关图书等,还有待纳入研究视野中。

中国的图书馆学在发轫之初即受到西方的影响,19世纪末 20世纪初,第一批有关图书馆学的译

著、译文被翻译发表。1920年代到 30年代,在以武昌文华专科学校为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中,在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倡导与实践中,大量英美图书馆学相关成果被引入中国,是西方文献的全面译介时期。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刊《图书馆学季刊》为例,该刊从 1926年3月开始发行第 1卷第 1期,至 1937年6月停刊,共 11卷,“其中刊载翻译或编译作品 44篇,在整个非文摘报道性文章中(427篇)占 10.30%”<sup>[40]</sup>。1950年代至 1960年代中期,在大量翻译、编译苏联文献的同时,西方图书馆事业、科技情报工作及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的文献也相继被翻译或编译,形成了专业翻译的第二个高峰,1980年代,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全面发展,出现了外文文献翻译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据景海燕统计,1901至 1998年,我国出版图书馆学译著 259种,发表译文 3346篇<sup>[41]</sup>。1990年代后期,中西方图书馆界互动越加频繁,96 IFLA大会在中国召开,接着,中文成为 IFLA的工作语言之一。目前,通过互联网,尤其是借助于覆盖面越来越广泛的图书馆联盟、便捷的信息检索及文献传递服务,国外资源得以在与世界同步的时间内及时呈现在国人面前。同时,中国学人逐渐走出接受和模仿西方技术和理念的描红阶段,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和专业思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现出高度的学术自信和专业水平。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外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交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

上个世纪 90年代末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出现了“外文引文多,原文翻译少;动态翻译多,原著翻译少;边缘专著翻译多,核心专著翻译少”的三多一少现象。各种论文和专著中引用外文文献的比重不断攀升,在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客中,域外资讯更为快捷地被翻译和传播。《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动态》、《图书馆报》积极报道域外业界动态。《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专设“新视野”、“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海外链接”栏目。“E线图情”积极地整合报道海外业界动态。程焕文等带来了海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概貌,吴建中打开了世界图书馆的美丽画卷<sup>[42]</sup>。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及海外华人学者纷纷以综述、述评的

方式推介国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sup>[43]</sup>。然而,在报道、综述增多的同时,译著却寥寥可数,编译、翻译的研究论文则微乎其微。1994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停刊、1998年《国外情报科学》被并入《情报科学》,正是一个明显标志。相反,具有更为广泛的学科特点的文献,如阅读学、图书学、管理学的文献的翻译则更为活跃。如近年来,《阅读史》、《夜晚的书斋》、《图书馆之恋》、《书店的灯光》、《别想摆脱书》等译作畅销且常销。除了版权引进这一主要关卡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直接用英语或其他语种发表文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不需要“二传手”,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翻译的落寞。

但是,高品质的专业翻译仍是十分必要的。大量的从业人员、学人和学生需要新鲜的养料,期待有智识的同仁将海外优秀的论文、重点图书与教材、重要的人物、关键的文件以及值得借鉴的观念与方法等及时、全面和真实地介绍到国内。因此,应加强专业协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加强与海外图书馆学人及学术团体的联系,成立专门机构,选择、推荐海外文献,开展版权引进,组织翻译、译校、审定、评价等活动,推动关键的图书、重要的词典、百科全书条目的翻译以及重大主题相关文献的编译,以推介海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还应加强专业英语教育,开发系列双语教学教材。在专业教育中,专业英语技能不仅是一种技艺的训练,而且是深入了解学科的途径之一。通过本科层次的专业英语,研究生层次的国外重点文献选读、双语教学,博士生层次的专业文献英语写作与翻译等,可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检索能力,加深对专业术语、重点人物等的了解。目前,在双语教学方面没有太多可用的资源。美国目前使用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生教材中,有一些已有中译本。如上文提到的泰勒的《信息组织》,但原著版本已更新;哈里斯的《西方图书馆史》,只翻译了第一、第二两部分,第三部分“西方现代图书馆之发展”未被翻译。卡茨的《参考工作》,只翻译了原著第一卷,且版本已多次更新<sup>[44]</sup>。因此,海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成果的及时引进,还有待具有翻译人才和学术实力的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积极行动。

翻译需要脚踏中西的文化积累,精到的语言表达能力,深厚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无私奉献的精

神,笔者谨以此文向所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历代译者致敬,尤其是向文中所涉及图书的译者致谢!再挑剔的食客也做不了大厨,但是,食客的细细品味正是对大厨的最深切的尊重和最诚挚的感谢。

## 参考文献

- 1 Baeza-Yates R, Ribeiro-Neto B. and et al; 王知津等译. 现代信息检索.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93
- 2 Baeza-Yates R, Ribeiro-Neto B. and et al. Modern information retrieval.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32
- 3 李国辉等. 信息组织与检索.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63
- 4 孙建军等. 信息检索技术.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323;正确的公式. 参见:Qiu Y. Frei H. P. Improving the Retrieval Effectiveness by a Similarity Thesaurus <http://e-collection.library.ethz.ch/eserv/eth:4438/eth-4438-01.pdf>;7
- 5 Zazo A F, and et al. Reformulation of queries using similarity thesauri.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05 (41): 1163-1173
- 6 袁咏秋,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85;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98
- 7 Shera J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1976:24
- 8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上卷. 何兆武,李约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92;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 西方哲学史 增补修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0
- 9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31
- 10 同7:32
- 11 同9:42-43
- 12 同10:3
- 13 同9:1986:6
- 14 同10:16
- 15 哈里斯;吴晔,靳萍译.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48; Harries M H.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fourth edition. Metuchen, N. J.;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1995:48
- 16 同1:95
- 17 同2:136
- 18 同9:18; Harries M H.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fourth edition. Metuchen, N. J.;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1995:97-98
- 19 金旭东等. 21世纪美国大学图书馆运作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北京图书馆,2007:349-351
- 20 皮高品. Bibliography 的字义与有关问题. 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3):58-63
- 21 程焕文等. 图书馆权利研究.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18-23

- 22 蒋永福. 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51—153
- 23 同 22:20
- 24 刘嘉等编译.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43—45
- 25 同 7:45
- 26 同 9:62
- 2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28 孙光成. 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 29 李衡. 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词典 (英汉汉英对照). Munchen; New York; London; Paris; Saur, 1984.
- 30 张蕴珊等. 英汉图书馆学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31 孙平. 英汉图书馆情报学词汇.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32 丘东江. 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
- 33 泰勒; 张素芳等译. 信息组织.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50, 51, 55
- 34 同 33:120
- 35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82
- 36 吴龙涛等译.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 上.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58, 63
- 37 同 33:122
- 38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83
- 39 同 36:4,282
- 40 刘宇, 宋歌. 《图书馆学季刊》载文计量研究. 图书馆, 2008 (3):49
- 41 景海燕. 近百年来我国图书馆学译作出版情况概析. 图书馆, 2000(5):19
- 42 潘燕桃, 程焕文.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吴建中. 世界经典图书馆建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
- 43 孟广均, 徐引篪.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肖希明. 图书馆学研究进展.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陈传夫. 图书馆学研究进展.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查先进. 情报学研究进展.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李刚. 情报学研究进展.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日)筑波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 中日图书馆情报学研究进展 (中文版),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进展: 2009—201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储荷婷, 张茵. 图书馆信息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44 卡茨; 戴隆基译. 参考工作导论: 基本参考工具书.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Katz W A.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Vol. 1: Basic Information Services. Boston: McGraw-Hill, 2002; Katz W A.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V ol. 2: Reference services and reference processes. Boston: McGraw-Hill, 2002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昆明, 650091

收稿日期: 2012年4月17日

## On Cross-check Reading between Translations and Original Works

Hu Liyun

**Abstract:** Through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some errors existing in the translations of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uch as following mistake which occurred in the original works, semantic ambiguity, and obscure terminology. It's necessary to do some cross-check reading between translations and original work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subtle meanings in original texts and appreciate translators' ingenuity.

**Keywords:** Translation; Original Work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